

在教师资格证国考制度下非师范生考证现存问题审视

张宝轩

榆林大学, 陕西 榆林 719000

DOI:10.61369/EST.2026080016

摘 要 : 自2016年教师资格证“国考”制度全面落地实施以来,迄今已近十载。本文聚焦这一制度变革,首先系统剖析其改革背景,接着探讨非师范生群体在考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为教师资格证“国考”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关 键 词 : 非师范生;教师资格证;教师资格考试

Examination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ertification of Non Normal Students under the National Teacher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System

Zhang Baoxuan

Yulin University, Yulin, Shaanxi 719000

Abstract : Since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examination" system for teacher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in 2016, it has been nearly ten year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is institutional reform, first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its reform background, then exploring the problems that non normal students face in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and finally proposing targeted optimization paths,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examination" system for teacher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Keywords : non teacher trainees; teacher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teacher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一、教师资格证“国考”的改革背景

2011年10月,教育部正式颁布并实施《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试行)》,同年率先在浙江和湖北两省启动教师资格国家统考试点工作。到2013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印发〈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的通知》,改革试点范围逐步扩大。2016年,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正式全面实施^[1]。

教师资格证考试由以往的省考模式转变为“国标、国考”模式,这一新举措打破了师范院校(专业)学生毕业后可直接获得教师资格证的固有特权,使师范专业学生、非师范专业学生以及社会人士处于同一起跑线,均需参加统一的国考,且在笔试和面试成绩均达标后,方可获得教师资格证。其核心在于借助标准化、科学化的选拔机制,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投身教师职业,优化了教师队伍结构,为提升我国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注入了新活力。这一举措有效提升了教师资格证的含金量,从源头上保障了教师队伍的质量,真正营造了“能者上,庸者下”的公平竞争环境。截至目前,教资国考已实施近十年。在长时间的实践检验下,国考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挑战和问题愈发凸显,这迫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深入思考。

二、非师范生考取教师资格证的潜在挑战

(一)非师范生在师范文化浸润中的挑战

师范文化是滋养教师职业专业化成长的精神底色,积淀着教育理念、职业信仰与育人价值的深厚底蕴。第一,教育理念的价值认同存在缺失。对于绝大多数非师范生而言,在校期间并未接受完整的师范专业培养体系训练,缺少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核心专业课程的深度熏陶。他们对于“教育的本质”“素质教育”“核心素养”等教育核心理念,大多仅停留在字面层面的粗浅认知,尚未形成深层次的理解与价值认同。部分非师范生仅将教师职业视作稳定性较强的谋生手段,备考全程以通过考试为核心目标,往往依靠机械记忆知识点来应对教师资格考试中的各类考核,而非主动内化教育思想内涵,全然缺乏教育工作应有的思想深度与育人情怀。第二,教师职业的认同感普遍薄弱。受当前就业市场环境等多重现实因素影响,不少非师范生将“教育行业的稳定性”列为职业选择的首要因素,秉持着“先拿证再择业”的投机心态,将教师资格证当作职业备胎;仅有少部分非师范生是出于对教育的真挚热爱而投身其中。这类考生普遍缺乏对教师职业的归属感与使命感,这种工具化的职业认知倾向与师范文化所倡导的育人情怀、教育奉献等核心价值理念相背离,也为其入职后在

作者简介:张宝轩(1998.01—),女,汉族,陕西省榆林市人,硕士学历,榆林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管理。

教育领域的长期职业生涯发展埋下了内生动力不足的隐患。第三，师范文化的传承链条出现断裂。师范院校的文化熏陶贯穿人才培养的全周期，通过教育见习实习、师德师风主题教育、校园文化熏陶浸染、优秀教育工作者言传身教等多元实践路径，实现师范精神的代际传递。非师范生并未经历这一系统的文化浸润过程，其对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育核心理念的认知大多来源于应试备考中的背诵记忆，难以真正树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念，入职后的教育实践也容易与师范教育的核心育人目标产生脱节。

（二）非师范生在速成路径中的挑战

在教师资格证国考全面推行、报考人数持续增长的大环境下，针对非师范专业考生的短期速成备考培训行业迎来了蓬勃发展期。这类机构凭借“短时备考、高通过率”的宣传亮点，帮助非师范生快速熟悉考试考查方向，顺利完成应试目标。但与此同时，也为考生后续的教师专业长远发展埋下了诸多隐性问题。第一，应试化培训模式禁锢考生专业素养的培育。市面上的教资培训机构以助力考生应试通关、快速拿证为核心目标，将系统化的教资备考知识体系拆解为零散的考点条目与标准化的答题模板。培训过程侧重引导考生机械识记应试知识点、套用应试解题技巧，甚至弱化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核心基础理论的系统化讲授与逻辑梳理，完全忽视了考生教育理论认知体系的构建。这就导致非师范生考生仅能碎片化记忆考试考点，无法构建起完整、系统的教育认知体系，难以依托教育专业理论知识去发现、分析、解决真实教学场景中的各类复杂问题。第二，培训体系的实践教学环节存在严重缺失。短期速成培训机构的课程分配高度向笔试刷题训练倾斜，直接压缩了实践教学模块的课时占比，课堂模拟、教育见习实习、微格教学等教师必备的实践训练内容达不到师范院校系统化的专业培养标准。在面试备考环节，培训也多依托模板化教案背诵与标准化话术套用来开展教育教学，并未对考生的真实教学能力进行全方位、体系化的提升。最终导致多数非师范生考生缺乏真实课堂的实操能力与临场应变能力，入职后普遍出现“只会考试不会教学”的困境。第三，价值观引导失衡。部分机构将培训重心完全放在应试提分上，仅关注“教书”层面的答题方法而非“育人”层面的价值引领，几乎未设置教育伦理与师德的专题培育与案例研讨，导致非师范生将功利化思维带入行业，对职业使命的认知停留在纸面，背离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三）非师范生在入职教学中的挑战

教师资格证国考仅完成职业准入筛选，非师范生进入一线教学岗位后，专业能力储备不足的问题会在真实课堂集中暴露，给个人职业适应、学校教学运转与教育质量带来一系列现实挑战。第一，教学技能脱节与适应周期长。非师范生职前未接受教学设计、课堂管理、学情分析等教学基本技能的系统训练，备考阶段掌握的多为应试化教案模板与答题话术，难以直接转化为真实课堂实操能力。

走上教学岗位后，这类教师常在教学环节设计、课堂秩序管理与突发状况处置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

障，相较于师范专业出身的教师，他们通常需要经历更长的适应阶段，方可独立完成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第二，教育生态与质量受损。部分非师范生受自身专业能力局限与应试思维定势的双重影响，在日常教育教学中更倾向于机械灌输知识，习惯将应试备考的经验直接生搬硬套用于常规课堂，忽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启发与拓展。长此以往，极易陷入“教师教得刻板僵化、学生学得被动消极”的恶性循环，既制约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与发展，也会进一步固化课堂教学生态，导致教学质量持续下滑。第三，再培训成本与校方担忧。“只考不育”的准入模式使非师范生岗位适配度偏低，学校需投入额外师资、时间与经费开展入职专项培训，补足其教育教学能力层面的短板。当前中小学校长对非师范生综合专业水平普遍存疑，招聘更倾向师范类毕业生，本质上反映出师资准入培养环节与一线岗位现实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四）非师范生在教学改革中的挑战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处于课程改革深化推进的关键阶段，新课标对教师的专业理念、专业素养提出了全方位更高要求，非师范生因职前缺乏系统师范培养，在适配与推动教学改革中面临显著的能力短板。第一，教学改革推进受阻。非师范生受自身知识习得路径与速成培训模式双重影响，更易固化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思维，课堂教学多依赖传统“填鸭式”教学方法，难以精准把握新课标中“核心素养”“探究式学习”等的深层逻辑，无法自主开发符合新课改理念的教学设计，最终导致基层教学创新实践难以落地的现实困境^[2]。第二，教育专业性被消解。新一轮课程改革对教师提出跨学科融合教学、个性化学习指导、课程资源开发等全新要求，但非师范生碎片化、非系统化的教育知识结构与教学能力储备，使其难以胜任这类专业性较强的改革工作，无法有效发挥教师队伍的课改专业引领作用，客观上造成教育专业属性消解。第三，师范教育价值被质疑。若大量未接受系统师范教育的非师范生仅凭短期速成培训便可通过国考入职，极易在社会引发“师范教育是否必要”的认知争议，弱化师范专业培养的独特价值，动摇我国教师专业教育体系长期构建的权威性与不可替代性。

三、非师范生考取教师资格证的改善策略

（一）有证书，更要有信仰

为推动教育家精神入脑入心，筑牢教师职业信念根基，激发持续学习动力。教师职业具有双重属性，教师专业是双重专业，一是学科专业，二是教育专业^[3]。在我国，教师博物馆的数量极为稀缺，目前仅有中国教师博物馆这一座承载着教师精神与历史记忆的殿堂。鉴于此，大力增设教师博物馆显得尤为必要且紧迫。这些博物馆通过实体化、场景化的展示方式，能够强化教师职业的神圣性与使命感，进而重塑“师道尊严”。在博物馆内设置“教育教学活动模拟舱”，借助VR技术还原课堂设计、学生互动、家校沟通等全流程，让参观者“亲历”教学现场。同时，创设“教师压力测试室”，模拟在VR场景中遇到家校冲突、学生自残等极端情境下如何做出应急决策等。通过教师职业沉浸式的体验，可实现从“职业旁观”到“价值内化”的转变，真正引发参与者

对教师职业的深度理解。当参观者走出场馆时，带走的不仅是新鲜见闻，更是重构后的教育认知框架。

（二）加强教师资格考核和认定制度

教师专业能力不仅体现在教师具备深厚的理论素养、丰富的授课经验和善于处理与学生家长和社区人士的关系，更核心的是秉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理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课堂实践逐步沉淀而来的。非师范生必须通过师范院校或综合类大学的教育学院进行教育类课程的系统学习，修满师范院校（专业）规定的学分，并且严格按照要求完成相应时长的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以此积累教育实践经验^[4]。只有在教育理论考核与专业实践考核均达标的情况下，非师范生才有资格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这是他们获取教师资格证的必要条件。权威部门需进一步强化对教师资格笔试及面试流程的质量监控与审核机制，在证书管控与发放环节，严格遵循既定程序，实施细致审查，并严格控制教师资格考试的通过率。

（三）组建专业化的教师职业培训机构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院长郑军建议由师范院校及相关专业牵头，组建专业化的教师职业培训机构，定期开展教师职业培训机构的资质评估，并委托这些机构面向社会开展教师资格考试中的教师教育实践能力培训业务^[5]。为落实该建议，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首先，构建“师范院校专家+中小学名师+培训机构导师”联合培训模式，引入正规的教育资源，提升培训的专业性。其次，建立培训机构和中小学合作的实践基地，要求学员完成一定课时的教育见习和实习，以此弥补培

训机构实践不足的问题，增强学员的实际教学能力。最后，构建培训机构大数据监管平台，实时监控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学效果等核心指标，对违规机构进行黑名单公示，保障培训市场的规范有序。

四、结语

综合前文对非师范生考证与从业全链条的问题审视可知，从教育实践反馈来看，非师范专业背景的新任教师在真实教学场景中，与师范生在专业能力、教育素养等方面的差距正日益凸显。这种差距并非单一教学技能的短板，而是涵盖教育理念认同、专业知识体系、课堂实践能力与教学改革适配性的全方位能力断层，是功利化速成应试路径违背教师专业成长规律的必然结果，对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家长教育信任构建及教育事业长效发展均构成潜在风险。

教师资格证国考作为教师职业准入的核心门槛，设立初衷是打破专业壁垒、吸纳多元背景的优秀人才充实教师队伍，但近年来该考试通过率持续处于高位，且考核体系偏重理论知识识记，对教育实践能力与育人情怀的甄别力度不足，使得教师资格证在衡量教师综合专业素养方面的含金量相对有限。从长远发展视角来看，如何在坚持开放准入的前提下筑牢专业质量底线，构建适配非师范生群体的职前培养与职后发展体系，推进非师范生教师教育培养模式的系统性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安雪慧. 我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证制度改革及影响研究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4, 45(03): 119-128.
[2] 教师资格证国考能考出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吗? [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17, 31(08): 91-129.
[3] 黄浩. 改革考试制度提高教师资格证“含金量” [N]. 中国教师报, 2025-03-05(002).
[4] 教育部. 《关于推进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11/202201/t20220121_595602.html 教师函〔2022〕1号.
[5] 陆道坤, 蒋叶红. 思想的混乱与发展的迷茫——对教师资格证制度改革背景下教师教育发展的思考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6, (10): 162-168.